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中美关系

■梁凯音

【摘要】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走向直接影响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双方利益进一步交织，彼此成为相互依存的“利益攸关者”。如何判断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中国如何以“利益攸关者”的身份发展和推进中美关系并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减少双方分歧和摩擦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后国际金融危机 中美关系 利益攸关者 责任大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0)07-0042-04

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走向直接影响着国际局势的发展。2009年中美两国所采取的建设性合作，使得全球金融风暴未能演变为上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的大萧条。但是进入2010年以来中美两国关系因一系列问题而陷入低谷，其中包括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以及互联网黑客袭击，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等，对两国关系发展造成严重的干扰。虽然美国对这些事件作低调处理，但无疑的是美国无视中国的核心利益，造成关系紧张的责任当然在美国。金融危机后中美双方利益进一步交织，彼此已经成为相互依存的“利益攸关者”。从美国方面来说，金融危机后它必须从以欧洲为重心转向依靠中国，与中国积极合作；从中国方面来说，它必须以“责任大国”的地位进入和美国合作的国际领导机制。这些实质上涉及到如何判断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中国如何以“利益攸关者”的身份发展和推进中美关系并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减少双方分歧和摩擦的重大课题。

一、中美双方实力的变化使美国对华政策陷于矛盾中

国际形势造就国际秩序，而国际形势的变化主要是通过大国发展与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来实现。过去几十年的国际秩序一直以美国为中心并由其主导，而这一秩序有两个支撑点：一是美国自己；二是欧洲。“二战”以后的美国历届政府都把外交战略的重心放在欧洲，大西洋两岸之间的关系随之变成了支撑国际秩

序的主要架构。就金融危机后的国际局势而言，美国实力削减的变化正是表现在这些支撑点上。

首先，美国现处于巅峰过后的走下坡状态，在实力减弱的同时对遍布全球热点问题的国际承诺也变成其巨大的负担。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冲击是根本性的，关系到它的经济是继续增长还是衰退的问题，而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压力加大的问题。以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为例，虽然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大幅下挫，外汇储备大幅缩水，金融稳定受到威胁，但都不具致命性，并没有根本动摇它们的实体经济。^[1]美国却不尽相同。在这一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与其他大国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一超多强的格局面临调整。俄格冲突和随后美俄对抗的升级，已经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实力对比变化对大国关系的影响。2009年冰岛金融危机后的举动也很值得关注。一个金融创新十分发达的小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几乎使冰岛面临经济崩溃，亟需外国资本救援。但美国在那时却束手无策，而欧盟也自身难保，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冰岛只好向拥有50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俄罗斯求援。^[2]除外，还有一个重要变化是，世界局势已经呈现出美国未曾预料的崭新形态，包括新兴国家的崛起，世界气候的问题和包括无处不在的反西方恐怖势力等。这些新事态及其后续结果是，在实力削减的同时美国对遍布全球热点问题的国际承诺更是无力应付。

第二，欧美关系趋于困难重重，美国再难以倚重欧洲。作为由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撑点的



欧洲，不仅因各自的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而自顾不暇，更主要的还对美国在世界上所引发的许多问题有自己看法。其主要有：一是在“如何领导世界”的问题上，美国和“老欧洲”有分歧。冷战结束后，大西洋两岸凭借文化的先进和财富与技术的雄厚，在经济和文化上向全球市场扩展，促成了上世纪9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繁荣和政治革新。然而重要的问题是，进入21世纪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超级强权地位并由此产生的独步天下的骄狂，使欧美开始发生了分裂：美国的单边主义是要用军事“硬实力”来威慑世界；而经验丰富的“老欧洲”则认为世界是多元的，只有文化“软实力”即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通过协商与合作才能影响世界走向民主、开放。二是在国际秩序的问题上，欧洲的经济实力已今不如昔，加上欧盟内部无休止的争吵和分歧，更使欧洲各国的决策和行动缺乏效率。其结果是，在美欧之间的战略合作框架之下，欧洲支撑点的实力削弱致使美国已无法有效地管理世界新事务。

由于以美国为核心和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支撑点发生了上述变化，美国已难以独自承担维护国际秩序的“重担”，而伊拉克、阿富汗、伊朗、朝鲜核问题和世界气候等棘手问题使其变得疲惫无力，在双边贸易谈判进程中美国也失去了热情和动力。美国遏制中国政策的能力正在弱化。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实力的变化致使其金融危机后对中国的政策处于矛盾心态的基本原因。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是，美国希望中国成为其“负责任的”伙伴。中国崛起及其发展前景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密切关注。从经济规模、综合国力、国际影响与发展潜力的四大因素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欧洲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国。美中关系的状态如何，不仅关系到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重建过程，而且更关系到美国能否继续保持自己主导世界秩序的地位问题。^[3]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尽快寻找到新的伙伴，与之分担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分享管理世界事务的地位，并协商制定各种游戏规则。在此“寻找”的过程中，美国把中国的角色定为“利益攸关者”^[4]，希望中国成为美国“负责任的”伙伴以减轻自己对国际承诺的巨大负担。但问题的实质是，美国只是希望将中国纳入现有的国际经济和法律轨道，遵守由自己制定的国际游戏规则，而自己能在这样的体系中保持永远

的、最强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是，自从中国开始在经济上崛起以来，美国又不忘散布和鼓吹“中国威胁论”，而这种对中国的戒备警惕之心将继续左右着其对华政策。在美国看来，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无论这些挑战是否出于中国的主观意愿。而在中国看来，中美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是双方发展速度快慢不同所导致的结果，也是和平竞赛、公平竞争的结果，美国不应该把中国的崛起当作必然的威胁。中美之间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互相遏制和竞争难以避免，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进行地缘政治上的遏制是很自然的，因此它还会继续以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利用日本和印度在亚洲制衡中国，并且会尽最大努力试图在全球范围内阻碍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努力。从这一点上说，中国至少在几十年内不要奢望和美国有建立起亲密的合作伙伴或同盟关系的可能性。

美国对中国崛起后的双方关系的矛盾交织点就是，在对于中国“挑战”其独霸地位非常警戒和排斥的同时，又希望将中国纳入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这清楚地表明：美国对中国在战略层面上处于一种非敌非友、似敌似友、可敌可友的不确定状态，而在具体实际操作中，美国还将继续维持务实互利的原则与中国进行交往。这也就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新走向。中美不会成为必然的敌人，但两国的关系永远具有两面性，即在战略领域互相遏制与反遏制，互相对抗和防范之外，美中两国还必须在众多领域里的合作。

二、中国应力求以“利益攸关者”的身份发展和推进中美关系

面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新走向，中国应力求以“利益攸关者”的身份保持与发展中美关系以稳定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主要任务是尽快恢复经济增长和继续维持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而这些任务与中国的利益及发展目标密切相关。作为中国出口产品的大市场，美国经济的好转无疑符合中国的经贸利益，而作为“利益攸关者”的中国在国际秩序的变化中有所作为，也符合中国的国际利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5]这可解释为中国对维护国际秩序的重要承

诺。中国要发挥适合其自身利益的“责任大国”的作用以应对中美关系的新发展，其主要是：

首先，要独立自主地积极建立和发展与美国的建设性合作关系，而其立足点是坚持把本国事务放在首位，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中国不仅是一个在综合国力上强大并有着重大的国际影响力的大国，也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市场。把本国事务放在首位，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对国际社会尽的很大责任。可以毫不夸张地这么说，“中国好了世界就好，中国不好世界就倒霉”^[6]。近年来，中国的综合实力得到了增强，无论是在国民生产总值、外汇储备、贸易总量等硬实力方面，还是在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等软实力方面都有显著提升。在全球化进程和世界格局走向的问题上，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将起着关键作用。另外，在如何对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全面”改革的问题上，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所要采取何种立场和态度当然必须为自己的利益目标服务，按照自己的判断，根据自己的能力，并且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重大的国际事务。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这一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应该是“渐进性”和“实效性”。^[7]可见，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态度是积极的、更是务实的，其立足点基于首先扎扎实实地搞好本国建设。

其次，在推动国际秩序中的多级化的同时，中国要坚持强调美国及世界各主要大国、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带头并共同遵守联合国宪章精神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实践中，还要彼此相互负责，不能只要求别人对自己负责，而自己却可以不对别人负责。在重大国际安全问题上，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上，不能由一两个国家独断专行。这一点对于应对国际秩序发展的新变化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问题解决好了，其他问题如果不是可以迎刃而解，至少是比较好解决了。我们并不主张大国共管世界，而是强调大国在国际事务问题上首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其表现为：一是国际关系不应以意识形态或国家制度划线，也不能以贫富差异或政策不同划线；二是努力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国际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提倡平等的伙伴关系；三是尊重发展模式多样化，承认各国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相互借鉴和取长补短；四是推动经贸关系互利化，放弃双重标准，寻求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双赢”。

其三，在建立重要的不同层次战略和经济的对话机制中，中美双方要撇开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务实而又有远见地摸索开展双边和全球合作的新模式，形成一个跨越太平洋的双边合作架构，以弥补乃至取代欧美之间传统的大西洋架构。不可否认的是，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不能用一种价值观来统领一切。价值观既有共性，也有特性。我们应接受共性，并用自己的特性去丰富它；同时也要承认和尊重特性，并在自愿的基础上，用共性去丰富和发展它。中美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包括发展阶段的不同、社会制度的不同以及价值观念的不同，这些差异都有可能成为破坏双方开展全球合作的障碍。^[8]相较于那些与美国有着共同文化特征的欧洲国家，中美之间的合作也许确实会遇到更多困难。但是，美国首先应该在对华关系上表现出远见、胆识和决断，挣脱传统地缘政治和外交思维的束缚，把推进两国关系作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核心目标。金融危机后中美关系的特点是越来越相互需要，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方面需求。简单地说，没有相互支持与合作，中美两国所追求的某些全球战略目标就无法实现。

最后，在非传统安全的问题上，要加强与美国所有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以增进彼此了解和扩大双方互利，建立和发展互信关系。非传统安全问题十分复杂，有着深刻的背景，涉及国家生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信息等诸多领域，深刻地影响着当前的全球政治、国际关系以及国家发展与社会和谐。令中国严重关注的是，贩毒、偷运非法移民包括贩卖妇女儿童、海盗、恐怖主义、武器走私、洗钱、国际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影响国际和地区安全的重要不确定因素，对国际和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新的挑战。“9·11”事件让美国突然发现它的主要威胁来自于恐怖袭击而不是中国，所以美国开始意识到两国合作的重要性。之后以反恐合作为契机，中美之间不断探索新的战略契合点。事实上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美关系是逐渐地发展成为“建设性合作关系”。

三、结论

由于以美国为核心和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支撑点发生了变化，美国遏制中国政策的能力在削弱。后国际



金融危机时期中美不仅在货币金融、贸易投资等经济领域，而且在国际和地区问题，甚至环保、能源、反恐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利益关系都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真正的“利益攸关者”。就根本而言，中美两国的关系永远具有两面性，其表现为：一是双方难以避免的相互遏制；二是双方也不会成为必然的敌人。中国只有充分的认识后金融时期中美两国关系的实质，采取积极的应对之策，才可能避免被动地应对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同时也可减少中国和美国等西方世界的无休止地陷于一些具体利益之争而找不到有效的根本解决方法的状况。在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中，中国应力求以“利益攸关者”的身份有效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对中美双方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 Greg Crucey, China-US Relations: Bad for Business? China Venture News, US, February 12, 2010.

[2] 《金融危机可能改写国际政治版图》，《广州日报》2008年10月18日。

[3] Winny Chen and Nina Hachigian, The Importance of U.S.-China Relations,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Washington DC, US, January 28, 2009.

[4] 《美国前国务卿佐利克在上海发表演讲提出“中美关系：全球利益攸关者”》，《文汇报》2007年3月22日。

[5] 《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www.Chinadaily.com.cn>。

[6] Brad Setser, Big changes, but not much adjustment: China's March trade data,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USA, April 10, 2009.

[7] 《胡锦涛在华盛顿20国领导人金融市场和经济峰会上讲话》，<http://www.cctv.com/default.strm>。

[8] John Pomfret, U.S.-China relations to face strains, experts say, Washington Post Staff Writer, US, Sunday, January.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责任编辑 魏静茹

领导干部和媒体是同志关系

《北京日报》2010年7月5日刊登《求是》副总编辑朱铁志的文章指出，领导干部和媒体的关系，是内在利益完全一致的同志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我们的媒体从本质上说，都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人民群众的喉舌。不能把媒体当成自己的对立面，当成执政党的对立面，当成随时随地挑错、添乱、找麻烦的对象。有一些同志对媒体和新闻舆论存在认识上的偏差，错把庸俗的歌功颂德当成“正面报道”，把健康善意的舆论监督当成“负面报道”，把提出敏感问题的记者当作“敌人”，动不动质问人家“是哪个单位的”，动不动威胁人家“我找你们领导去”，态度之颀顽，形象之丑陋，实在令人不齿。

中国的老百姓是最通情达理的，中国的新闻媒体是最顾全大局的，只要坦诚相告，合理解释，即使一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大家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这里的关键，是通报情况要及时、准确、全面、权威。不能以“顾全大局”为借口，“瞒”和“骗”，“捂”和“拖”。须知，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现场直播者，尤其对于重大事故和群体性事件，及时发布，时刻保持信息的公开透明，是争取主动的最明智选择。

领导干部面对媒体时既要谦虚谨慎、如实相告，又要注意理智应答，不卑不亢。要了解公众心理，讲究问答艺术。我们的领导干部在上任之前，多半没有经过新闻培训，缺乏面对媒体的起码经验，要么紧张不已，不知所措，要么讳莫如深，惜墨如金，要么三缄其口，溜之乎也。凡此种种，都很不堪，都与现代领导干部应有的形象格格不入。

既然如何面对媒体是每一个领导干部的新课题，就更加需要虚心学习，多方面总结。在实际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十忌”：一忌闪烁其词、故弄玄虚；二忌装腔作势、缺乏诚意；三忌东躲西藏、无可奉告；四忌虚与委蛇、虚应故事；五忌居高临下、傲慢无礼；六忌语无伦次、言语乏味；七忌上下推诿、不负责任；八忌百般封堵、肆意阻拦；九忌信口开河、乱下结论；十忌好为人师、耳提面命。